



以观念论为准则，坚持数学般的精确、明晰，一方面，观念论导致了人物的坚实与高雅、情节的紧凑与省俭、文风的简洁与洗练；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人物的机械与僵死、情节的间断与断裂、文风的冷峻与严肃。

司汤达小说研究

夏多多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司汤达小说研究

◇夏多多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汤达小说研究 / 夏多多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
广东有限公司, 2013.5

ISBN 978-7-5100-6242-1

I. ①司… II. ①夏… III. ①司汤达(1783~1842)-小说
研究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3787 号

司汤达小说研究

策划编辑 李 梦

责任编辑 刘文辉

封面设计 谷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长沙市开福区山君彩印厂

规 格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6242-1/I·027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 引 言 / 1

第一章	“中心”的威力 / 8
	第一节 权力 / 11
	第二节 观念 / 23
	第三节 监视 / 36
	第四节 惩罚 / 47

第二章	“少数”的诞生 / 57
	第一节 精英 / 60
	第二节 本色 / 71
	第三节 想象 / 81
	第四节 激情 / 91

第三章	一个人的战争——抗争篇 / 103
	第一节 拿破仑情结 / 106
	第二节 对抗男权 / 119
	第三节 对抗专制 / 132
	第四节 晚年司汤达 / 144

第四章	一个人的战争——妥协篇 / 156
	第一节 虚伪 / 159
	第二节 参与 / 169
	第三节 无力 / 181
	第四节 逃避 / 192

第五章 | 一个人的战争——化解篇 / 205

第一节 夜色 / 208

第二节 自由 / 218

第三节 爱情(上) / 229

第四节 爱情(下) / 249

第六章 | “少数”的落幕 / 269

第一节 越过的山岭 / 272

第二节 幸福的“少数” / 284

第三节 永恒的死亡 / 297

参考文献 / 309

后记 / 315

引言

司汤达(1783~1842),是法国十九世纪最卓越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也有其独特的位置。原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名律师,思想极为保守,拥护王权与教会;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属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但在小贝尔七岁时逝世。母亲早逝后,对小贝尔极为冷淡的父亲再婚,并把他交给一位严厉的神父看管,这造成了日后司汤达对神父的蔑弃与对基督教的批判,同时也使小贝尔自然倾向于信仰启蒙运动思想的外祖父,培养了亲近启蒙思想、向往共和的激进雅各宾党人的立场。

1792年,贝尔进格勒诺布尔市中心小学读书,四年后进入中学。这所学校是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宗旨是培养爱国者与专家之才。正是在中学,他跟随老师格罗学习数学,并为数学无可争辩的精确性与真实性所折服,为后来文学创作上的观念论奠定了最初的根据。1799年,贝尔中学毕业,准备求学于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然而时代风云改变了世界状况,也改变了贝尔一生的轨迹。就在这一年的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政权,开始了长达近十五年的拿破仑时代。贝尔在表兄达吕的影响下参加军队,追随大军远征意大利,直趋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向往与热情,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此外,意大利北部湖区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艺术音乐也对司汤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意大利遗事》、《帕尔马修道院》某种程度正是意大利革命情结与人文地理的卓越产物。然而军队的枯燥生活使贝尔难以忍受,终以病假之由回归故乡,并在1802年至1804年中大量研读哲学与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尝试写作戏剧,但并无佳绩。1806年,拿破仑的辉煌战绩重新燃起了贝尔的从军热情,直至1814年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垮台之后,贝尔才彻底终结了政治之

2 司汤达小说研究

路,走上了艺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途。

1814至1821年,贝尔基本居住在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米兰。此时正是意大利受奥地利专制统治的时期,也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终于引起了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当作烧炭党人驱逐出境。在这期间,他完成了自己最初的文学积淀。1815年在巴黎出版《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塔兹传》,这是贝尔的首部著作。1817年,出版《意大利绘画史》,首次使用“司汤达”这个笔名,之后成为其最常使用的笔名,并最终成为他的独特标志。同年还出版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主要刻画19世纪初叶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社会生活,观察敏锐,思想犀利。并在这一年初次尝试写《拿破仑传》,但未完成。

1822年,司汤达出版《论爱情》,寄托对倾心热恋但未果的奇女子梅蒂尔德的眷恋之情。1823年,出版《罗西尼传》,并因为参与当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笔战而出版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此书热情呼唤浪漫主义,反对伪古典主义,堪称“法国浪漫主义的第一次宣言”,也折射出司汤达关注现实、呼唤革新的文学品质。这一时期,司汤达经常出入法国巴黎的沙龙,喜交际、好议论、常臧否,并于1825年出版《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1827年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丝》,关注特殊人群——阳痿患者——的坎坷爱情命运。1828年,对意大利念念不忘的司汤达重返米兰,再次遭遇奥地利警方的驱逐,回到巴黎后写作《罗马漫步》,于1829年出版,获得歌德的赞赏。也就是在这一年,司汤达着手写作《红与黑》,并于次年出版,但印数寥寥,评论家也是一片嘲讽谩骂之声,倒是耄耋之年的歌德认为这是司汤达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并认为司汤达具有女性般的细腻心灵与敏锐观察。

随即爆发七月革命,法国建立由财阀控制的七月王朝。1831年,司汤达担任契维塔—韦基亚领事。领事工作枯燥无聊,司汤达一面在欧洲各地游历,一面笔耕不辍,1832年写作《自我中心回忆录》,论述1821

年至1830年的生活感受。1834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红与白》,但未完成。1835年,写作《亨利·布吕拉传》,叙述他本人18岁以前的生活,充满了乡情与沉思,纪德认为是司汤达写得最好的作品。1829年至1839年司汤达依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典籍资料、逸闻掌故,陆续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并于1839年出版结集本《意大利遗事》。1836年至1838年司汤达在法国、瑞士、莱茵地区、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地游历,1838年出版游记《旅人札记》,另外一本《法国南方游记》则迟至1927年才作为遗著出版。1838年11月4日至12月25日,司汤达仅用52天就写成了《帕尔马修道院》这又一熠熠生辉的长篇巨著,于次年出版,并同时写作又一晚期转向巨作《拉米艾尔》,但未完成。1841年3月15日,初次中风,仍然坚持写作。1842年3月22日傍晚在巴黎街上行走时突发脑溢血,失去知觉,于23日清晨2时逝世。

严格说来,司汤达并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红与绿》随书评论认为:“司汤达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在外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意大利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他还自诩为英语文化研究家、西班牙语文化研究家,不言而喻,还是德语文化研究家。”他一生同时跨越音乐、绘画、小说、散文、传记、哲学、评论等多个领域,并且都有专著问世,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司汤达最突出的小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宽广视域、深刻体察的融通性成果。要想研究其小说的深刻底蕴,避开他的散文、自传、哲学、评论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本文虽然以其小说世界为主要观照对象(不仅仅是《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而是他所有的长中短篇小说,包括《红与白》、《阿尔芒丝》、《意大利遗事》、《红与绿》),但同时也广泛地参考了其他非小说的文本(主要是《旅人札记》、《自我中心回忆录》、《论爱情》、《拉辛与莎士比亚》、《书简》等),以期获得更宽广、更深厚的研究地平线。

司汤达的小说,目前学术界尚未见明确的分期。以笔者之见,略去时间上的先后分段,从内在理路入手,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阿尔芒丝》、《红与黑》为代表,创作观念上以观念论为准则,坚持数学般的精确、明晰,一方面,观念论导致了人物的坚实与高雅、情节的紧凑与省俭、文风的简洁与洗练;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人物的机械与僵死、

情节的间断与断裂、文风的冷峻与严肃。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司汤达前期创作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期以《红与白》、《帕尔马修道院》为代表,创作观念上由观念论转向模糊说,因为阅历的提升与创作经验的丰富使之认识到观念文学的局限:追求绝对真实却走向了生活的失真,追求绝对精确却抽空了事物本身,追求细节的再现却使人物丧失了整体的形象。他必须重新充实事物,把切割的零件组合成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赋予他们鲜活的内容和饱满的内部。由此产生了与以往观念论时期不同的美学风貌:人物显得立体多面,更具灵动潇洒的气质;情节衔接自然,具有整体的画面感;文风趋于温和,不再迫使人们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而是裹挟在温情的遐想之中。晚期以《A—想象》、《唐·帕尔多》、《拉米艾尔》为标志,司汤达又转向激进,表现出的对理性的拒绝、对道德的破坏、对底层人物求存极致的肯定,显示其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经典作家走向具有反人文倾向的与现代性思潮若合符契的先锋作家的朕兆。晚年的司汤达替自己的时代承受着直觉的苦痛,将生活转化为自己的体验和本能,再转化为一种文学行动。本能、直觉、欲望是生活的汇聚地,司汤达将文学创作拉到了与个人体验、与内心、与直觉、与欲望交叉的场地,小说不再是某种观念或理型的再现,而就是生活,就是体验和欲望。

司汤达小说具有当下性与批判性的特质。“啊,先生,一部小说是在大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类似的话在司汤达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是司汤达创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以一种类似戏剧的场面,再现历史大事;用精彩的艺术手法揭露尖锐的政治问题;用讽刺的笔墨表达深刻的哲理。由此他极为重视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有一个副题:《一八二七年巴黎一个沙龙的某些场面》;《红与黑》的副标题是《一八三〇年纪事》;《红与白》提到路易·菲力普统治最初几年的工人起义,选举的弄虚作假和其他一些丑闻。在这方面,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式样和巴尔扎克的颇为不同:他宁可放弃历史家所享有的那种回首瞻望的办法,而去处理在他写作的当时在自行展现过程中的社会现实。司汤达之所以选择表现当下,出于以下考虑:首先,他体现了司汤达对于现实的独特理解。

现实虽然是易逝的,甚至是杂乱无章的,但如果有敏锐把捉力的话,能够很好表现时代精神,毕竟他是活生生的当下!其次,也体现了司汤达独辟蹊径的勇气与决心。当大家都还在模仿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或者沉湎于都市情感不能自拔的时候,司汤达的开拓是胆识、远见与魄力的一种综合体现。再次,现实与历史小说的不同是,他必然触及很多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①政治体制与权力系统,司汤达的每一部现实之作如《红与黑》、《红与白》、《帕尔马修道院》几乎都触及了当权者的隐痛,揭露了许多社会的弊端,有些暴露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不管是从涉及的空间,还是揭露的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度,也成为了文学创作中呐喊的最强音!

司汤达小说具有内倾性与情感性。司汤达的雄心不在于比前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们未曾看到的,说出他们未曾说出的,因此他的心理开掘并不显得比巴尔扎克的包罗万象无用,因为他开掘了一个不同的新的领域。有人曾问司汤达从事什么职业,他一脸严肃地回答:“人类心灵的观察者。”茨威格把他列为心理小说发展的中间阶段,而司汤达小说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对现代小说发展的影响几乎已经获得举世公认。至于情感,较之列夫·托尔斯泰对婚姻生活的深刻思考,司汤达是写情的高手,他属于年轻人的代言人。在他的笔下爱情绚丽多彩:为了爱可以自愿被囚禁在监牢,为了爱可以抛弃荣华富贵,为了爱甚至可以打破身份等级的限制,为了爱连心灵桎梏宗教情怀也会被冲破,为了爱不惜以身犯险!司汤达深爱过梅蒂尔德,因为失恋差点自杀,《论爱情》的长篇专著就是为这段爱情而作,而他的人物显然比他更疯狂,都是爱中圣手,情之所深,如痴如狂!当然,司汤达作品处处涉及爱情,却不是一般的爱情,他总是写边缘人的爱情,如阳痿患者奥克塔夫的爱情,身份差异巨大的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情,法布里斯与克莱利娅的监狱爱情,共和派吕西安与保王党夏斯特莱夫人的马拉松爱情,颇有现代意识。司汤达作品难以被当时的读者接受,与他爱情主题的边缘化、尖锐化、超前性,有很大关系。当然,司汤达的小说尽管善于精妙绝伦地分析爱情的一切韬略,但对性与性行为本身则是遮遮掩掩,因为他对爱情表现出一种十分清洁的、高雅的、纯净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十足的柏

拉图主义态度,表现出一种与快感相对的自制而又清澈澄明的态度。快感在性欲中,交流在爱情中。

本书试图从“中心”与“边缘”的相异相生的视角阐述司汤达独特的小说世界。有“中心”,就有“边缘”,“中心”往往具有真理、逻辑上的优先性,它支配“边缘”,“边缘”以认同“中心”而得以确定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基础之上:存在着人从本质上得从属于它的某个更广大的理性秩序,倘若人是理性的生命,倘若成为理性的也就是在拥有关于它的一个真正见解中与这个较为广大的秩序发生联系,那么人只有在同这个秩序发生如此联系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他自身。区分中心与边缘,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边缘的存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并非一件顺理成章、确定的事情,而总是一个问题,一种赌博,一种风险;面对大写的历史,他们总是处于自我防卫的姿态,因为这一历史力量超越着他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甚至都看不见他们。中心化很可能僵化,中心化由于其巨大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它总是对创造性的扼杀,中心化是惰性的集结地,是惯习的温床,是陈旧的病菌,同时也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然而存在就是差异,个体不能被共同体同化,个体永远具有相异性,个体相异性具有不可公度和不可通约性。个体的单一性、相异性,永远也不会真正在共同体中达成一个整体,或融入其中,分享也就意味着错位。司汤达的主人公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对专制的仇视,对神学的蔑视,对等级的藐视,使他们不是顺应生活,而是怀疑乃至批判现实。当这批“少数”不再承认共同体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进行“反思”的时候,即当他们转向自身,把自身看作最为重要的具有个体目的的个体时,个体便产生了,司汤达的主人公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先锋。他们无法同于这种公共的生活,他们现在感到那些规则是强制性的,那些规则在任何一个现实中都是虚而不实的。作为个性化的边缘人物他们总是启动了一些新的空间,一些新的可能性,一些未来的道路和方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标新立异的角色,是敲边鼓的人物,他们总是对正统,对中心性有所回避或有所挑战。法布里斯与克莱莉娅的监狱爱情就是无历史、无政治的个体行为。在行动中,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意

图、目标和理念,并认识到自身是不同于普遍的某物。于是,他们“堕落”了,“中心”强大的同化功能对他们失效了,他们疏离中心而有了不一样的生存轨迹:奥克塔夫自杀拒绝了公共生活,于连对自己的死刑听之任之毫无营救之举,法布里斯躲进修道院彻底回避了人类。他们的原则是自由:思想必须在完全自主情况下发展起来,它无法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甚至不接受上帝的权威,它只依赖于能够在自我意识中得到呈现的东西,它要实现充分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对自我有了新认识:每个人的实现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为任何一个别的他者所预见和描述。

“少数”与社会的差异越大,遭遇的抵抗力也越大,所以他们绝少是主体,几乎总是历史的客体。但中心的压制并不能消除“少数”,而是加剧与制造着“少数”,“少数”正是在与中心的对抗中成其为“少数”。于连的行动正是过度压制下的一种反抗与挑战,他的与众不同正是与社会不合作的态度,较之他两个哥哥的墨守成规毫无波澜,他虽死而成为一种强大的挑战中心权威的异质性力量。

“少数”的历史,“少数”与“中心”的关系的历史长期被人遗忘,它遗落于史学家的视野之外,也遗落于哲学的视野之外,不要在“中心”的自身范围内谈论“中心”,要从“中心”的他者,从“少数”的视角把握“中心”,让“中心”现形、出场、自我暴露,让“中心”的面孔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司汤达追溯“少数”的命运,意在追溯“中心”的命运,“少数”愈是得到详细的描述,“中心”就愈是得到详实的暴露,因为“中心”无处不在地纠缠着“少数”,“少数”的语境就是“中心”。如果“少数”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自然所指,如果将“少数”视作是“中心”的反题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少数”是一大堆近似词的换喻:小偷、罪犯、梦想家、越轨者、放荡者、精神错乱者,所有这些都具有反社会的要素,“中心”无一例外地跟踪尾随着它们,继而将它们固定起来,排斥出去。这样,“少数”主题的框架实际上盛满着所有的“中心”对立面,所有的“中心”排斥物,所有的“中心”敌视者。“少数”不再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人数多寡,而是“中心”狂妄自信的一连串反证。司汤达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也可以从“少数”的悲剧性命运得到确证。

第一章 “中心”的威力

历史并无“中心”，却拥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只在意识形态中才会有必然“中心”。有“中心”，就有“边缘”，“中心”往往具有真理、逻辑上的优先性，它支配“边缘”，“边缘”以认同“中心”而得以确定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基础之上：存在着人从本质上得从属于它的某个更广大的理性秩序，倘若人是理性的生命，倘若成为理性的也就是在拥有关于它的一个真正见解中与这个较为广大的秩序发生联系，那么人只有在同这个秩序发生如此联系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他自身。就像于连这类处于权力之外的边缘人物，他本身并不自足自立，面对“中心”的时候他是脆弱的，他拼命挤进上流社会是想与这个更高的理性秩序发生联系从而成为他自身。当他被上流社会接受时，他认为是有有限的精神超越自身的特殊，从而被提升到普遍高度，其实不过是“中心”对“边缘”的一种同化，个体的特殊性消磨殆尽，个人成为中心普遍化运转的一个齿轮。但个人并不自知，待遇的改善、身份的提高、荣誉的增加，使个人自以为从特殊上升为普遍，其实中心化并不必然代表个人本质力量更大程度的跃升，倒是特殊性的牺牲是必然的。中心化的这种强大同化力量，其根底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寻求在场的同一性，寻求终极真理，它理所当然要讲建立意义的秩序——思想、真理、权力、理性、逻辑、概念、范畴等等都被看成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存在基础。因此毫不奇怪，所有与思想、真理、权力有距离的“边缘”人物被贴上无知、疯狂、不道德、不理性的标签，就像费朗特被视为“疯子”，于连被视为“野心家”，吕西安被视为“放诞不羁”，法布利斯被视为“叛国者”。

逻各斯中心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国家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最早的国家是以力征服的典型，并不需要论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随着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洗礼，国家、君主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合法存在，它必须与科学、理

性、公正等结合并体现公意,才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司汤达时代的现代国家处于形成阶段,民主法律制度远不健全,大量的封建专制君主还在支配国家,“国家”只能意指“政府机构”之类的东西,说它们是市民的“本质”或“终极目的”只能意味着向无法无天的专制屈服。全体而完全的参与的渴望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某个集团肯定会操纵局势,掌握实权。这个集权是一个真正的小帮派。但是它不会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小帮派,因为这将损害它的合法性。相反,它声称它是一般意志的体现,所有其他帮派都被斥之为有罪过的帮派,就像《帕尔马修道院》中以莫斯卡伯爵与拉维尔西为首的两大派,掌权的一方必然攻击另一方为不合法,当莫斯卡失势时受其保护的法布利斯马上遭到了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专制政府,只能以践踏在法律支配下的个人意志为代价而存在,并且这时无人遵纪守法。普遍此时不仅不是真正的精神,不是个体自由的体现,而且还是一股压制它们的消极力量。这种压制往往表现出集体压迫,是少数人借助权力与体制便利进行的找不到具体凶手的无形压迫:统治为自成一体的整个社会提供了连贯性和支配力,对个体而言,统治表现为普遍性,即现实中的理性,借助于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分工,社会一次又一次带来了整体的实现,整体的合理性也恰恰以此方式得以成倍增长。最后,少数人对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呈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支配:即社会压迫总是表现出集体压迫的特征。就像于连之死,找不出具体的凶手,拉莫尔侯爵的逼迫、弗里莱尔代理主教的背信弃义、瓦尔诺的置之死地、法官们的合谋,都参与了这个事件,是集体压迫,而且冠冕堂皇——以维持社会安定之名判处于连死刑。

“中心”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它以权力为枢纽,通过与真理、道德等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紧密联系,以塑造天然具有向往中心的亲和力来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没有普适真理,各个时代被奉为真理的论述往往与当时的权力、道德、法律密切相关。权力甚至操控、遴选真理,看看各个时代的人性论就可略知一二:“人”的概念是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制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西方社会,从来都是以建构一个符合该社会及时代要求的“人”的概念为中心,同时

建构其社会文化系统,以便使各个时代的社会及文化,都能够和谐地围绕着生活于其中的人而运作;反过来,历代思想家们也要求生活于各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够按照该时代社会文化制度的正当化标准而生活。“人性论”等“真理”的宣传是塑造和熏陶的“软性”手段,控制和嵌制是“硬性”的带强制性的手段;两者一张一弛、紧密结合、相互循环转化,既实现了个人自身的自我规训,同时社会体制也渗透并获得了公民的普遍认同。司汤达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几乎都接受了修道院的教育,软性的熏陶使她们很难摆脱基督教人格,“越轨”之后一般都会自我谴责、自我监督以回到“常轨”,强制性的压迫与出走之后的压力使她们更难越雷池一步。

存在就是差异,个体不能被共同体同化,个体永远具有相异性,个体相异性具有不可公度和不可通约性。个体的单一性、相异性,永远也不会真正在共同体中达成一个整体,或融入其中,分享也就意味着错位。但中心为利益计、为便利计,总是倾向于划一化,总是要肯定、维护某种中心,隐瞒、压制、排斥某种边缘性的东西,它有必要通过与它利益攸关的压制才构成自身的历史。在西方社会文化历史上,西方传统文化及其维护者,为了给统治阶级的统治行动所进行的“正当性”论证,一向都是自称为“人”的一般利益的最高代言人,总是将自己说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把罪名、脏水泼给无权无势的被压迫者。司汤达小说中的主人公处处受到排挤,到哪里也不受欢迎,正是被压制的边缘性力量。这种压制,一方面通过权力的分配与行使使利益趋向极大倾斜于掌权者,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自觉认同这种不公并希求通过个人努力跻身权力阶层。还有,法律警察系统的硬性监督与基督教教育的软性忏悔,使任何逸出中心常轨的力量得到及时的把握与控制,更有对敢于挑战中心权威的边缘力量进行残酷惩罚的警戒措施。

区分中心与边缘,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边缘的存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并非一件顺理成章、确定的事情,而总是一个问题,一种赌博,一种风险;面对大写的历史,他们总是处于自我防卫的姿态,因为这一历史力量超越着他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甚

至都看不见他们。司汤达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都是丰富的,人格是高洁的,情操是高尚的,但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性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些什么?绚烂的爱情、高贵的灵魂、高雅的情趣,又能改变什么命运吗?根本不能!

第一节 权力

权力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是一种命运,因此,不管掌权不掌权,人无法逃避权力。权力不纯粹是消极的:权力作为无所不在的社会力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权力作为社会力量关系网络,不但可以成为统治的力量,也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大众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力量。司汤达所处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作殊死斗争的年代,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政变、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使二者的力量反复交替,专制权力日趋没落,但对社会的控制依然强大,所以司汤达的权力不具生产性,往往是暴力的、血腥的、消极的。在司汤达的小说世界中,权力无处不在,他扭曲人性,摧残生机,生杀予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权力的运作

没有抽象和静止的权力,因为权力从来都不是像“东西”那样独立存在。权力的问题,不是“它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怎样运作”的问题。权力是只有在其运作中才存在的活动网络,它的运作始终都同知识、政治、法律等因素紧密相连。司汤达展示权力,虽然倾向于揭露专制权力残酷、荒诞的一面,但也是把它放在社会的活生生的关系网络中,将它当成运作中的复杂关系,一种不断变动其运作策略并随时随地相互拉扯的力的关系网络。所以,司汤达小说世界里既有权无者如于连的惨淡境遇,也有法布利斯既受权力保护又受权力迫害的双重交织,还有吕西安参与权力运作的形象揭示。

(一) 权力等级

权力等级具有变动性,于连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定程度修改了权

力格局;权力等级具有荒诞性,掌握法布利斯命运的人恰恰是沾满鲜血满手铜臭的人;权力等级具有压迫性,无权力者处于弱小无力被摧残被扼杀被毁灭的境地。先看变动性。卷入权力游戏中的各种因素,一旦松懈其战斗力,就有被其他力点征服或消灭的危险。各个力点如果真的要维持其意想中的地位的话,就必须尽其全力投入斗争;不然,就会被整个权力游戏的残酷性淘汰“出局”。在权力关系网络的运作过程中,如果会出现某种平衡状态的话,那么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变动是其常态。于连本是弱小的无权者,但成为拉莫尔侯爵的秘书后,他甚至能决定维里埃尔彩票经销处的候选人,一旦触动拉莫尔侯爵的家族利益时又被毫不容情地作为打击对象而陷于死地;瓦尔诺本只是贫民收容所的所长,但后来挤倒雷纳尔成为市长,最后又升任为省长,倒是雷纳尔一蹶不振。

再看荒诞性。权力一旦掌握在某个人手上,不管是否胜任,不管人品如何,他在地位上都优越于被权力掌控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倒可能是清白无辜的。在《帕尔马修道院》中,通过大主教的嘴,我们才知道司书巴尔博纳杀死过自己的亲兄弟,而这种人居然还在执法,可见法律与警察制度的荒诞性!同样还是在此书中,法布利斯误杀吉莱蒂之后惴惴不安地来到了边境检查站,他胆战心惊,随时准备破窗而逃,而检查护照的警官显然更是心惊,法布利斯冒用的护照名字吉莱蒂正是他的朋友,而且正是他给吉莱蒂的护照予以签证:“万一查出是我,吉莱蒂的朋友,在别人拿着他这张护照的时候,在护照上签证的,我的上司们又会说什么呢?”^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警官特意放行。“正是这些粗野的畜生将要决定我和你的命运!”^②这是吉娜愤激之时对掌权者荒诞性的控诉。

最后看压迫性。“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免于受到诱惑,他们多么

①司汤达著、郝运译:《帕尔马修道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63页。

②司汤达著、郝运译:《帕尔马修道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39页。